

試探「文心雕龍」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王更生

「文心雕龍」是我國重要的一部文論寶典，自隋書以下，歷代史、志均有著錄，宋、元、明、清、果朝都有翻刻；注釋、校勘之作，更是不乏人；近六十多年來，中外學者專家，考論評述它的作品，在海內外著名雜誌上發表的，也年有數起，由以上幾種情形，已足以透視「文心雕龍」的學術價值，和它對我國中古、近古、以及現代文學批評界的鉅大影響力。但是我們不容忽視的是它在中國文學史家就通史的觀點上所處的地位。所以筆者願就此加以探討，並求教於治文學史之學者。

一、研究緣起

中國之有文學史，始於清光緒二十四年（民前十四年，西元一八九八年，日本明治三十一年）八月，由日本東京博文館出版，笹川種郎著的中國文學史，隨後有一位數在中國汕頭、廈門、寧波、上海、等地擔任英國副領事的翟理斯（Allen Herbert Giles），在光緒二十六年（民前十二年，西元一九〇〇年，日本明治三十三年），也出版了一部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接着國內學術界起了回響，於清光緒三十年（民前八年，西元一九〇四年，日本明治三十七年），京師大學堂國文講席林傳甲先生，仿日本笹川君的支那文學史，用紀事本末的體例，以不到四個月的短促時光，成十六篇，四萬八千言之中國文學史，遂開中國學人有系統的研討本國文學之風氣，於是竇警凡的歷朝文學（光緒三十二年出版），王夢曾的共和國教科書中國文學史（民國三年八月商務版），曾毅中國文學史（民國四年九月上海泰東圖書館版），張之純中國文學史（民國四年商務版），朱希祖中國文學史略（民國五年北京大學講義），謝朓量中國大文學史（民國七年十月上海中華版），葛適禮中國文學史（民國十年一月上海會文堂初版），相繼出版問世。民國十年以後，由於新文學運動的衝擊，全國大、中學校對中國文學的研究甚囂塵上，相應而作的文學史或文學批評史，不啻風起雲湧，根據梁容若、黃得時二位先生，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合著之重訂中國文學史書目的記載，截止到民國五十五年八月以前出版者，僅中文部分；計通史六十九種，斷代史三十七種，專史一百零二種，共二百零七種，其他日文、英文的著述尚還不計，即有如此驚人的數目。再由民國五十五年八月，迄今民國六十四年，時光荏苒，又屆十稔，國內有關文學史之專門新作，殆將急遽增加，則為數更較二百零七種者為多。誠如梁容若先生所言：「總覽中國

(62)

文學史研究之歷程，由範圍、史料、史觀、上去看，五十年來進步之迹顯然。見梁著中國文學史研究一二頁。自然如此，各文學史家以莊嚴之態度，參綜博考，將中國文學三千年來晦明變化之迹著為專書，而類似「文心雕龍」這部文論寶典，恰產生於文學璀璨的六朝，它上承古聖先賢的文學思潮，下開後世文學批評之風氣，其必然佔有中國文學史或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席次，所以我們如從歷來各家所著中國文學史上去探索文心雕龍的地位，將它和中國古、中、近、晚、各時代的文學發展系聯一氣，這樣對「文心雕龍」的研究，無疑的會極具參考價值。

筆者因授課之便，從事本問題的研究，開始於民國六十年的暑假，去今倏忽一年又半，以個人甄採所得，較諸梁、黃二先生重訂中國文學史書目二百零七種之數，當然有瞠乎其後之感；但如祛除與「文心雕龍」絕對無關之專史、斷代史的話，綜其大要，則本人所見五十八種中國文學史或批評史之數，亦大體粗具。豹窺一斑，鼎嘗一臠，則循此以討「文心雕龍」在中國文學史上之地位，庶乎近之矣！

二、「文心雕龍」五十篇之分類

吾人欲知「文心雕龍」的意義，不能不預知其內容分類；而分析歸類最為詳盡的要算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達史。劉氏此書原分上下冊，上冊初版於民國三十年（西元一九四一）一月，下冊初版於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一月。他論文心雕龍的地方，就在上冊，第十三章南北朝與隋代的文學趨勢，第四節批評文學，第一小目內。文中首引梁書劉勰傳，說明劉勰生平事跡；次援劉毓崧先生說，以為「文心雕龍」成書於南齊之末。見劉毓崧通誼堂文集書文心雕龍後；然後統論「文心」內容，共歸納為五大類。即：「一、全書序言：序志。二、緒論：原道、徵聖、宗經、正緯、四篇。三、文體論：辨騷以下二十一篇。四、創作論：總術、附會、比興、通變、定勢、神思、風骨、情采、鎔裁、章句、練字、聲律、麗辭、事類、養氣、夸飾等十六篇。五、批評論：知音、才略、物色、時序、體性、程器指瑕等七篇」。這種按照「文心」各篇性質相近，作為分類的標準當然是對的；不過稍後的羅根澤先生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較劉書為晚出版，民國三十二年八月（西元一九四三年）重慶初版，三十八年二月（西元一九四七年）上海再版。也許就是斟酌劉大杰書的優點，兼採彥和自己的分類法；而析「文心雕龍」為上下兩篇。他說：「上篇共二十五篇，原道是本乎道，徵聖是師乎聖，宗經是體乎經，正緯是酌乎緯，辨騷是變乎騷，明詩、樂府、詮賦、頌贊、祝盟、銘箴、哀弔、雜文、諧謔、十篇是論文；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書記、十篇是敘筆」。又說：「文心雕龍的上篇二十五篇，可以說是文體論，原道、徵聖、宗經、正緯四篇，雖近於文學本原論；但總是各種文體之所從出，則與其說是文學本原論，無寧說是文體總論。下篇二十五篇，則除了時序、知音、程器、序志四篇，都可以算是創作論」。可見劉、羅兩家的分類頗有出入。最明顯的是羅氏分「文心」為上、下二篇，而將劉氏所謂之批評論，和全書敘言之序志歸入創作論，屬於下篇；將劉氏所謂之緒論，原道、徵聖、宗經、正緯，以為是

文體所從出，併入文體論，屬上篇。雖然他也承認有批評論，如時序、知音、程器、序志，但不另外析出。

到了民國五十年前後，在香港服務的有位趙聰先生，曾經由九龍友聯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一部中國文學史綱，本書除緒言之外，計七章二十六節，其中第三章第五節，曾論述文心雕龍全書結構，當然這是一個與衆稍有不同說法。他說「文心雕龍全書共五十篇，所討論的範圍相當廣泛，除序志一篇乃全書序文之外，其餘各篇的內容，可以歸納爲以下三部分：第一，是文學概論，原道、徵聖、宗經、等開宗明義的幾篇。他以爲文學創作是人性的靈與自然接觸後的自然映現。猶如天地山川的形象，草木雲霞的顏色，林籟泉石的聲音，所自然呈現出來的美麗與和諧，他把自然界的文采，說成是道；文學就是本着這種自然之道產生的，他推崇孔子和六經，指明這是中國文學的源泉，表明了他對文學創作背後的歷史文化基礎的重視。第二，是文體分析，是辨騷至書記等二十一篇，關於文學體裁的分類曹丕在典論論文裏，只分了四類，陸機在文賦裏，只分了十類，劉勰則擴爲三十三類，比較詳細的多了，分類之後，他曾加以闡說，對各種文體都給予了明白適當的定義，并辨別了他們之間不同的風格，論述了各體的淵源和流變，批評了各體的代表作家和作品。第三，是創作及批評的理論。他在體性篇提出八種風格；從作品體裁分，有典雅與新奇，從內容與思想分，有遠奧與顯附，從藝術與技巧分，有精約與繁縟，從氣勢與風趣分，有壯麗與輕靡。他在情采篇提出了文質并重論，也就是內容與形式的調和，情思與藝術的合一。他在才略、程器等篇說明應具的才識，在神思、養氣、等篇說明靈感的培養，在時序、物色、等篇說明作品的時代精神和地方色彩，在章句練字等篇說明修辭的重要。關於批評的理論，在知音、定勢、通變、聲律、等篇闡發詳盡；並具體的提出六個批評的標準，即體裁是否與風格氣勢相合，修辭美醜是創作抑模擬，個性和寫作的態度，題材和主題，有無音樂性」。

另外黃公偉先生在民國五十六年（西元一九六七）九月，由台北帕來爾書店出版了一本中國文學史，在該書第五篇第四章文學評論一節裏說：「文心雕龍有綱有目：依今而言，則論文藝哲學者，如原道、徵聖、宗經、正緯，以闡明文學思想之源流；論純文學體裁者，如辨騷、明詩、樂府、詮賦、四篇，以辨文體沿革與得失；論散文者，如論說、議對、奏啓、章表、檄移、雜文、書記、等七篇，以闡釋散文體裁之興革變化；論應用文者，如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弔、詔策、封禪、等七篇，以闡示應用之性質與用途；評述著述文學者，如諸子、史傳、二篇，申論學術文之由來與價值；凡此二十四篇皆屬於綱。依次有屬於商榷文學風格者，如神思、諸體性、風骨、定勢、情采、養氣、等七篇，以論構思、抒情、脈絡、之重要。談論文章學理方法者，如事類、總術、物色、時序、附會、通變、知音、才略、程器、等九篇，則言文學構成之要道。泛論修辭者，如鎔裁、聲律、麗辭、夸飾、隱秀、指瑕、等六篇，以揭示修辭之原則。商榷文法者，如比興、章句、練字、等三篇，指陳文章篇法、章法、句法、字法、之關鍵。凡此三十五篇，則屬之目」。

其他如鄭振鐸插圖中國文學史（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初版），陳鐘凡魏晉六朝文學（民國十八年十月商務萬有文庫版），施

慎之的中國文學史講話（民國三十六年文星再版），以及日人兒島獻吉郎中國文學通論（昭和三年（西元一九二八）初版），青木正兒的中國文學概說（昭和十年（西元一九三五）東京弘文堂初版），亦均不出以上各說的範圍。其中祇有青木君在「文心雕龍」的分類上，又加入「文礎論」一項。他說：「全書五十篇，可試分為六部分：一、自原道至正緯四篇，為文章之起源。二、自辨騷至書記二十一篇，論各種文體及其源流。三、自神思至定勢五篇，論作文之基礎。四、自情采至隱秀十篇，論修辭法，五、自指瑕至程器，並論關於文學全般之事，可以看作總論。六、序志篇是自序。作者以為除掉自序，則全書有文原論，文體論，文礎論，修辭論，總論。這樣的組織，實在是空前絕後的完備的評論」。綜此可知，各說參綜錯雜，人各為言；但近六十多年來，中國文學史家言「文心雕龍」內容分類者，要不外乎此。

三、文心雕龍持論的要旨

各文學史的作者，在把「文心雕龍」粗別大類的同時，自然兼及於它持論的要旨。過去日人青木正兒著中國文學概說，於第六章評論學中，就曾首援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上的說法，較論「文心雕龍」之不同衆作，如四庫總目分古今評論詩文之作有六種：即（1）「品評作品者，如鍾嶸詩品。（2）記載關於作品之故實者，如唐孟榮之詩本事。（3）論文學之體者，如晉摯虞文章流別論。（4）講文學理論者，如唐釋皎然之詩式。（5）有系統之論述者，如梁劉勰之文心雕龍。（6）隨筆雜錄者，如宋歐陽修之六一詩話」。似此，則劉勰文心雕龍，乃古今第一部系統完具的文學論著，在行文持論方面，一定有它獨具的特色。例如華師仲慶的中國文學史論（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開明初版），第六章第一節第四目文學的欣賞與批評中，以為劉勰和在文學批評上有幾個重要理論，是「（1）情事與辭采，彥和深明齊梁唯美之風而忽視內容，特一方面尊重藝術進步的成績，他方面作文質並重之提倡，故有情事與辭采之說。（2）先天與後天，先天才性為文學變遷和作品優劣的決定因素；但後天之學習與修養，亦極重要，彥和深切了解文學是先天才性與後天環境融合的產物，個人情感與社會潮流、時代精神的反映，乃有此先天後天並重之說。（3）品藻與彌綸，此言文學之不可以偏概全，不但品藻一篇，並要以客觀的態度，彌綸全局。所謂全面之知，才是真知也」。這是從文學批評的觀點，去看文心雕龍的要旨。

郭紹虞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恰好可以補足華師立說的缺陷，他說：「劉勰一方面要『彌綸群言』，使局部而散漫者得有綱領，一方面又要『擘肌分理』，使漫無標準者得以折衷，所以他是當時文論之集大成者。文心雕龍之所以成為條理綿密的文學批評之偉著者以此」。

至於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達史，對劉勰的文論，也有幾點重要的觀察所得。如「（1）文質並重論。（2）文學與環境。（3）批評論的建立」。尤其在批評論的建立方面，他依據序志篇、知音篇作為論證的要件，而歸納出劉勰和批評論的統緒，是「第一、批評家

的修養。第二、批評家的態度。第三、批評的標準」，並云：「由這六個標準觀置辭，三觀通愛，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官商，去客觀的品評文學作品的價值，比起那些印象派的主觀批評來，所得的結論，自然要正確得多了，中國古代的學問，任何方面都缺乏方法與條理，缺乏科學性與客觀性，所以劉勰這種批評論的建立，確實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了。」

羅根澤先生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對文心雕龍全書的要旨，更有極其詳盡的分析，他首列劉勰的幾個主要的文學觀，是「(1)原道的文學觀。(2)抒情的文學觀。(3)自然的文學觀。(4)創造的文學觀。」他追溯文心雕龍中的主導思想，與劉彥和對文學的基本概念，這一點，對我們研究文心雕龍的人說來，提供了最偉大的服務。其次羅氏在文心雕龍的文體論方面，更深究明察，發現了許多劉勰行文之法則，即「第一，論各種文體的定義，就是釋名以章義。第二，論各種文體的區別，如頌贊篇，於說明頌的定義以外，又分析頌與雅的關係，第三，論各種文體的相互關係，如樂府篇，說樂與詩的關係，第四，論各種文體的產生，第五，論各種文體的沿革，就是原始以表末。第六，論各種文體的類別，如論說篇，說論的類別，第七，論各種文體的作家及作品，就是選文以定篇，如哀弔篇說弔的作品，第八，論各種文體的體用及方法，就是數理以舉統，如哀弔篇說哀的體用及方法。第九，論各種文體的共同淵源」。平時我們談文心雕龍文體論，多就序志篇所謂之「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數理以舉統」為說，而羅氏演繹歸納，推陳出新，成此九大原則，更見文心之論文體博大精深為何如也。關於文心雕龍的創作論，羅氏說：「劉勰討論創作論的文章，計有神思、體性、風骨、通變、定勢、情采、鎔裁、聲律、章句、麗辭、比興、夸飾、事類、練字、隱秀、指瑕、養氣、附會、總術、物色、才略、二十一篇，約而言之，不外(1)才性。(2)文思。(3)文質。(4)文法。(5)修辭。(6)文氣。(7)音律。(8)比興。(9)風格等九方面」。另外羅書有文學與時代一節，把文心雕龍的時序、才略二篇攬為論據，他說：「文心雕龍全書五十篇，都是文學理論，止有指瑕、才略、程器、知音、四篇是文學批評。指瑕批評作品，才略、程器批評作家，知音闡明批評原理」，羅書較晚出，又能獨具慧眼，博採衆長，所以把文心雕龍的持論要旨，分析得巨細靡遺。為有志研究文心雕龍的學者，畫了一個清晰的輪廓。

四、劉勰著述文心雕龍的動機

劉勰著述文心雕龍本不明言寫作的動機，言其寫作的動機者，始於唐初劉知幾。子玄在他的史通自序中說：「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之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味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這雖然傾向於文心雕龍產生的時代背景，但任何時代背景，也必定是牽動著述的重要誘力。

羅根澤先生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引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云：「今之文學，作者雖衆，總而為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釋，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迴，宜登公宴，本非準的，而疏慢闌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醅不入情。……次則緝事比

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觀事例，頓失精采。……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鍾嶸詩品序亦云：「……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納，蠹文已甚」，因此羅氏認爲「六朝文學，講辭藻，講事類，講對偶，講聲病……可以說是最無內容，最不自然的時代，所以隋朝的李諤上文帝論文體輕薄書說；「江左齊梁，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韵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這種情形，劉勰深懷不滿，於是羅氏就文心序志篇加以深究，並參照梁繩禪先生在「文學批評家劉彥和評傳」一文上的成說，認爲「劉勰作文心雕龍的動機，名山事業的念頭，只可說是他努力制作的原因，不能說是制作文心雕龍的動機，制作文心雕龍的動機，實是因爲不滿意於當時的創作與批評」。

後來方孝岳著中國文學批評，在該書的第十七章上，就不儘滿意這種看法，而又別有修正，他說：「劉勰作這部書的宗旨，好像是自居於孔門文學之科，他說他自己夢見孔子之後，就想『敷讀聖旨』；但是『敷讀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他覺得文章是一切的根本，所以就以推闡「文心」爲「敷讀聖旨」的工作。看他的意思，好像以爲這種工作的價值，還在馬、鄭注經之上」。可說「彥和又以爲後世文風日壞，應該拿古聖之正訓，來提醒學者，所以他在序志裏又說：『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肇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奧，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這又是針對時弊。從前有人說，陶淵明人非六朝之人，文亦非六朝之文；劉彥和這種抗心獨往，冥契道真的態度，也可以說非六朝之人了」，揣摩方氏的持論內涵，似乎「敷讀聖旨」，才是彥和闡揚文心的動機。

民國四十九年（西元一九六〇），黃乾、沈英名二位先生爲僑民教育函授學校，合編的一部中國文學史話，在續集「劉勰與文心雕龍」一章裏，立說與方氏同。

五、文心雕龍成書與佛教

明曹學全序梅子庾文心雕龍音注云：「傳稱勰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名僧碑誌，多其所作。予讀高僧傳，往往及之；但惜不見全文一篇，總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十餘年，博通經論，定林寺經藏，勰所次也，竊恐祐高僧傳，乃勰手筆耳」，高僧傳是梁慧皎的手筆，史有明文，自不可能爲勰所著，不過他引梁書本傳以說明劉勰與佛教的關係，倒是值得治文學史的人注意。王惟儉文心雕龍故訓序亦有：「余反覆斯書，聿考本傳，每怪彥和晚節，燔其鬚髮，更名慧地；是雕靈均之上客，實如來

之高足也。乃篇什所及，僅般若之一語；援引雖博，罔祇陀之雜言，豈普通之津梁，雖足移人，而洙泗之畔岸，終難踰越乎？其對文心雕龍與佛教的關係，深表懷疑；但又不得其解。近入范文瀾先生文心雕龍序志篇注，引釋藏跡十釋慧遠阿毘曇心序，以為「彥和精湛佛理，文心之作，科條分明，往古所無」，似又肯定印度佛學的進步思想方法，對彥和的治學方法有極大的影響。王利器先生文心雕龍新書序錄，引劉知幾史通論讀篇，說史書贊語與釋氏偈言相似之點，以為文心雕龍可能也是受了內典的啓示。饒宗頤先生寫了一篇劉勰文藝思想與佛教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文心雕龍研究專號第十七頁，他在文末的結論上說：「總之，佛學者，乃劉勰思想之骨幹。故其文藝思想亦以此為根柢；必於劉氏與佛教關係有所了解，而後文心之旨，斯能豁然貫通也」。然後香港有位石壘先生，著文心雕龍原道與佛教義疏證一書，對文心雕龍與佛之關係的研究，可以說是爬羅剔抉，獨闢蹊徑，最後他斷定：「文心雕龍所原明明的道，是佛道」見該書一頁。這種說法，也不是沒有人懷疑，例如楊明照先生「從文心雕龍原道、序志兩篇看劉勰的思想」一文，他把「原道」、「序志」兩篇做通盤而審慎的研究之後，說「就原道、序志兩篇推定，劉勰寫作文心雕龍時的主導思想為儒家思想。……其他各篇是不是相同呢？個人認為一樣地是儒家思想」，陸侃如先生也有一篇「文心雕龍論道」的文章發表，其結論約分三點：「第一，劉勰的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義的，但也有唯心主義的因素，第二，劉勰認為儒家之道和佛教之道，都合乎自然之道。但文心雕龍是討論中國文學的，所以不用佛教的語彙。第三，自然是客觀事物，道是原則和規律；文學應該符合自然之道，也就是符合于客觀事物的原則或規律」。綜合上說，可見劉勰文心雕龍與佛教的關係，久已引起學術界人士的高度的關切；而治中國文學史的博雅君子，對這個問題當然是不會淡然處之的。不過也許由於事涉專門，真正對他作傾心研究的學者並不多。其中劉大杰中國文學發達史，對這方面談的還算是比較詳盡。他說：「文心雕龍作於齊代，時序篇說的『暨皇齊馭寶』，是可靠的證據。由此可知這本書，是他早年的著作，由徵聖、宗經、序志、諸篇，對於孔子六藝的話看來，我們可以推論到他作這本書的時候，恐怕還沒有信仰佛教，或則已在研究佛典，還沒有到堅深信仰的地步，所以在那些文字裏，沒有半點佛理的影子；而處處顯示進步派的儒家的理論來。我們更可進一步的推想，如果這本書不在他的早年完成，他晚年必定放棄寫這一類書的計劃；即使著作，他的意見必有大加更改的事，是非常可能的。惟其如此，這本書倒顯示了他的特殊意義，因為書中的理論，完全是出於文學批評者的立場，而沒有混雜宗教的主觀色彩，使這本書更加純化，更值得我們重視了」，劉勰的這一段話，可歸納成以下三個要點：一是文心雕龍成書於彥和未信仰佛教，或已在研究佛典以前，二文心雕龍論文是不帶宗教的主觀色彩，完全出於文學批評的立場，三是在晚年，產和一定放棄寫這本書的計劃。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達史缺點很多見梁容若先生再評中國共列七大缺點，一體例編排的失當。二材料去取的偏頗。三襲前人的誤說。四引，但對「文心雕龍與佛教」的關係，這一點却是空谷足音，言人之所未曾言，或不敢言。雖然他不算是千秋定論，但能批卻導窳，別開生面，為研究文心雕龍的人立下一座新的標竿，倒不失為尋根討葉的史學眼光，總比那些不問究竟，驟下斷語；或避重就輕，略而不言的人，要好得多了。

六、文心雕龍的缺點

文學隨着時代潮流不停的在運轉，何況文心雕龍是南朝齊、梁間的產物，當然會受到時代的局限，和劉勰自己的觀念所囿；所以其中堪資批評的地方也還不是沒有。宋黃庭堅與王觀復書，以爲「文心雕龍所論雖未極高，然譏彈古文，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劉勰「不知書有論道經邦之言，其疎略殆過於王、杜」。清史念祖文心雕龍書後，說劉勰爲文「徵引既繁，或支或割，辭排氣壅，如肥人艱步，極爲騰蹕，終不越江左墜徑」，時人王夢鷗先生著文心雕龍質疑見故宮圖書季刊一卷一期，說此書有兩大毛病：「一是文辭上的陷阱，二是理論上的窮巷」，又沈謙先生近作文心雕龍批評論發微，也說「文心雕龍亦非盡善盡美，仍有其局限與缺點，不容回護也。第一、語意模稜，言辭游移，第二、例證虛泛，譬喻曖昧。第三、浪漫文學，評價未允。第四、論文對象，仍欠穩妥」。另外，還有一位在唐朝時代，由日本來華的留學僧，名遍照金剛的，他將在華所得，編了本文鏡秘府論，其中天卷四聲論，談到劉勰文心雕龍，他說「此論理到優華，控引弘博，計其幽趣，無以間然。但恨連章結句，時多澀阻，所謂能言之者也，未必能行者也」，以上各家，或從部分篇章，或從全書大體，或推衍其理，或歸納群言，來批判劉勰與文心雕龍，正見本書由於受到時代的局限，不可避免的會瑜中有瑕了，至於文學史家批評文心雕龍缺失的，首推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他說：「總之爲書，宏博圓通，而過事精微，翻成苛細。如麗辭篇列舉言對、事對、正對、反對、之別，而判其難易優劣，已爲辭煩，練字篇復有論字四擇，頗病煩碎」，劉大杰中國文學發達史，在討論到文學體裁的時候，針對文心雕龍文體論部分，他認爲「劉勰在文心雕龍裏，幾乎費了一半的篇幅，專門討論各種文體的問題。他在這一方面，雖費了不少的氣力，然而我們現在看起來，在全書這是價值最低的一部分。因爲在那裏面，有幾個不可掩飾的缺點：一、文學的觀念不清楚。二、次序雜亂。三、分類沒有統一性，四、議論時多牽強附會。凡是讀過那二十一篇文章的人，想都有那種感覺，我也無須在這細說了」，這些可說都是些率直的指摘，誠以時移勢變，居今而言一千五百年前成書的文心雕龍，如果硬說他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非愚則迂。不過「聖人之過也，如日月之蝕焉，人皆見之」，我們對文心雕龍也應作如是觀。

七、研讀文心雕龍之門徑

文心雕龍的內容，固別區分，自是如此的繁富見本文第二節文心雕龍五十篇之分類，吾人應採取何種方法去拓展研讀之門徑；然後循序漸進，得窺彥和文論之優美，這實在是我們當前迫切體認的課題。各文學史家，或因著述的態度不同，在以辭抒意的時候，難免有詳彼略此的現象；所以綜覽各著，談到研讀文心雕龍門徑的爲數並不多，甚或如顧實中國文學史大綱民國十五年商務初版，以爲「文心雕龍太近於專門，概從省略」見該書第八章六朝文學第七節六朝文的末一段，這可以代表一般治中國文學史家們的意見。至於專門研究中國文學批評的郭紹虞先

生，無論是他的新、舊批評史，對這方面的問題也都隻字未提。

朱東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是民國三十三年，開明書店出版的一部採記傳體方式寫成的集子，他在該書第十二章說，「此期云中國文學批評家，當以沈約爲先驅，其後之偉大作者，則有劉勰、鍾嶸、蕭統、顏之推，此四人主張固不盡同，然有一共同之點，即對於當時文壇之趨勢，皆感覺有逆襲狂瀾之必要，文心雕龍之作，其中心思想，實在於此，必能如此，然後對於劉勰方有真實之認識；否則，列文心雕龍於齊梁，終成爲不辨是非也」。朱氏並以爲「總究心佛理，故長於持論。文心雕龍之主旨見於總術篇，其對齊梁作品之評論，一言以蔽之曰『訛』，『訛』弊之由，在『文不宗經』，故劉氏又折而言『通變』，『通變』之道，則託於『復古』，『復古』之旨，實在『革新』，而必以『復古』爲名者，所謂假物以爲濟也。非勘破此點，則於劉氏之旨，不能盡明。自言復古，必樹準的爲之根據，是以文心以『原道』『徵聖』『宗經』三篇冠之，其對各種文體，溯本討源，在乎『宗經』，文心雕龍之論文，先破當時文筆之界說，於上篇備稱各種文體，其中分有韻、無韻二類，體大思精，故知劉氏持論之精之廣。下篇論文術，獨標『神思』二字。其篇實亦全書中聚精會神結構完密之作，總評論文章，標三準六觀之說，而以『爲情造文，要約而寫真』爲其樞紐」，朱氏又以爲「自來論劉氏者，多舉下篇，而於上篇分論文體者，每多忽視。其實立言完整，自具精義」，其暗示研讀文心雕龍之門徑，學者宜先把握全書旨要，在於矯訛翻淺；劉氏著述之精神，在於徵聖宗經，然後破除世俗究心下篇，多略上篇之流弊，庶幾可以沿波討源，知所津逮了。

時人宋海屏先生乘講學餘暇，前年有中國文學史之出版，其於研讀文心雕龍的次第，較之他家之說，尤爲完密，他說：「(一)序志篇今列篇末，應先讀，蓋全書之序也。(二)原道、徵聖、宗經、正緯四篇，全書之總論也。(三)全書之精華，則爲神思、風骨、情采、總術、通變、定勢、鎔裁、練字、章句、聲律、麗辭、隱秀、比興、養氣、夸飾、事類、附會、等十七篇，蓋文章之作法也。(四)時序、物色、才略、程器、指瑕、知音、體性、等七篇，蓋文學批評之佳作也。(五)至於明詩、辨騷、樂府、詮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諧謔、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書記，等二十一篇，則分述各類文體，似可略讀」。宋氏分文心內容爲五個類別，同時也是他心目中研讀的順序。

過去方孝岳先生在中國文學批評

民國二十三年
世界書局初版

上所開示的讀法，有與宋氏不謀而合的地方。他說：「……凡是古人這種大著作，所有的自序，都是自表曲折的用心，詳細告人以探索的門徑，不是隨便說一點緣起的。要知道文心雕龍的宗旨，務必細讀他的序志……他的書，除了序志一篇外，共四十九篇，前二十五篇，分論各種文體，是論其外形，後二十四篇，評論文章作法，是論其內心，他自己所謂篇數準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正是他託體甚尊的地方，也就是說這序志一篇，通貫四十九篇的宗旨……」

雖然在中國文學史的史料上看，關於這一部分的資料不多，就是有也是仁知各異；但如果我們能舉一反三，則研讀文心雕龍

(70)

之門徑，雖不中亦不遠矣。

八、文心雕龍對學術界的影響

文心雕龍有毀有譽，但因其體大思精，陶冶千秋，終竟是瑕不掩瑜。談到文心雕龍對當世及後代學術界的影響，更是治文學史的學者們所一致關注的。據胡懷琛中國文學史概要說：「劉勰文心雕龍可說是一部文學原理兼文學史、文學批評的書」，以之與鍾嶸詩品，任昉文章緣起相較，他說「三書之中，以文心雕龍為最好，雖然他的見解，在今日看起來很有不對的地方。他用四六文寫，也是個錯誤，但在當時不能說不是一部傑作，到現在還沒有失掉歷史上的價值。唐、宋以後的詩話、文談之類，雖然是多到不可勝數，但是能夠有系統如文心雕龍一般的却不多見」。這是從文心雕龍與後代詩話文談的體例上看，固然詩話文談遠祖文心，而文心言出有據，却始終居於領先的地位。施慎之中國文學史講話第三章說：「劉勰所著的文心雕龍，討論古今文體及其作法，和唐劉知幾史通，清章學誠的文史通義，稱中國文學批評之巨著」，其實史通、文史通義又如何能與劉勰文心雕龍相提并論，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第十七章不云乎：「唐朝劉知幾史通，自然也是了不得的書，雖是專門論史，但他自負兼有法言，一直到文心雕龍這些書的美點。像他那些惑經疑古諸篇，拘文牽義，瑣瑣爭辨，實在全沒有通人氣象。我們只要一看文心雕龍夸飾篇所說，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標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孟軻所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這一段話，就可以大破知幾之妄。一個是鴻文妙手，一個是拘墟之儒，沒有文學修養的人，不但不可以作文人，也何嘗能夠通經著史呢？」所以方氏進一步認定劉勰的宗經論，一直影響清末文壇，而發曾國藩文論之覆。他說：「劉勰覺得文章是一切的根本，所以就推闡文心，為敷讀聖旨的工作……我們看近代古文家曾國藩說，『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這種精義，豈不早有劉彥和先發其覆麼？」我認為劉彥和的卓見，何止發曾氏文論之覆，就是與他並世的沈約，也常把文心置之几案，備為參考。日人兒島獻吉郎中國文學通論第二章序論云：「魏、晉以後，論文的著述雖多，然而已經亡佚的亦不少。試就現存之書，舉其鐸鐸者，則有齊劉勰的文心雕龍十卷。文心雕龍是代表六朝的論文修辭的書，分原道以下五十篇，前半二十五篇概論文體，後半二十五篇，主要論修辭的工拙利病，不但大可資後人典據，就是當時沈約也常把這書置之几案」，自然文心雕龍之論文，適用於當代，領袖未來，所以無錫錢基博在他著的中國文學史，第六章第七節裏，便稱文心是中國文學批評的開山，他說「雕藻之盛既極，非難之聲起，簡文以『儒鈍殊常』為病，子野有『淫文破典』之譏。雖所蔽不同，而為文弊一也。淳澆救靡，必出復古，遷雄之體格，可以起殊常之儒鈍，經誥之旨歸，庶幾式破典之淫文，止禮義以敷章，矯風骨而振靡，此唐之韓愈，所

以起八代之衰也。若夫雕琢性情，揚權利病，而發其英議，導之前路者，厥有劉勰之文心雕龍，此吾國文學批評之開山也」。劉大杰中國文學發達史也說：「因為劉勰最懂得文學的性質與意義，所以他對於創作與批評的艱苦，也瞭解得非常深切。他對於當代文學批評界的偏於主觀與印象，以及未能達到求因明變的工作，感着不滿……他認為要樹立精密的批評，必先要免去這些流弊。批評誠然是難事，如果批評家有公正的態度，廣博的學識，與客觀的批評標準，這種困難是可以克服的。因為文學是個人情感與社會情感合流的表現，同時又是共有的時代精神的反映，並且文字構造的美妙，與音調的和諧，都可加以人工的分析和說明。那末一個作家和一種作品，一定都有他的可以說明的客觀的價值。他說「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人情，沿波討源，離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見知音篇}，他在這裏說明文學批評完全是可能的事。為要達到這種可能的階段，於是他建立了最有系統的客觀批評論」。由此看來，文心雕龍不僅是文學批評的開山，更是最有系統的客觀批評論，不僅在當代就受到學術界人士的注意，時至今日，他還是歷久彌新，為文學批評理論的前鋒。

九、文心雕龍的評價

就本人所搜得的文學史資料分析，最先注意到文心雕龍的價值的，是謝朓量中國大文學史，謝書分中國文學的演進為上古、近古與近世，到道咸以後之文學及八股文之廢，全書六二五頁，二十萬言。其第三編中古文學史，第十九章梁文學，第三節文選與詩文評中，摘取梁書劉勰傳，並引文心雕龍序志篇，以徵文心雕龍成書的過程，並謂「詩品與文心雕龍二書，蓋後世詩文評之宗也」，推崇甚力。民國二十一年十月開明版的陸侃如、馮沅君合著中國文學史簡篇，於上編第九講散文的進展下，提及南北朝的文學批評家時，便以為「劉勰五十篇是一部傑出而有組織的文評，他對於各種文體與修辭的方法，都曾詳盡而精闢的中述。南朝文學得到他，理論的基礎更形鞏固」。陸氏伉儷之言，較謝文加詳而具體。容肇祖的中國文學史大綱，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出版的，書中特別注重每一時代的新興文學，所以在第二十五章梁陳文學的新發展內，列有批評家的新趨勢一節，謂「文心雕龍以當代最難達意的駢儷文體作成，其天才之偉大當屬可驚」。這是從文心本身價值，推到劉勰的絕代才華，更進一步的拓展了謝、陸兩家立說的範疇。民國二十七年，楊蔭深著中國文學史，第十章批評文學的開端，列有南北朝間兩大大文學批評家一節，其中記述文心雕龍時說：「像這樣一部完備之文學概論，不要說前此所未有，即後來亦很少有；至全書均用四六駢體，亦為美文之至的，其說亦正中時病」，他讀文心雕龍是空前絕後之巨著，唯美文學的鵠的，補偏救弊的藥石；這種評論，在民國二十年代的文壇上可說是慧眼特識了。

羊達之的中國文學史提要，向以條分縷析見長，他在二九四條評文心雕龍的價值時說：「批評文學始於魏文帝典論，然評論

所及，無過當代。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皆邁乎古今，言文藝批評者，無不祖述之。劉勰字彥和，著文心雕龍五十篇，前半論文章之變遷，後半論文章之工拙。議論精湛，見解卓絕，實為文學之鎖鑰，藝苑之津梁。文心雕龍之價值，不僅在文藝批評上有特殊之見解；全體之駢儷，而能暢所欲言，其本身即是一部文學傑作，故極為後世詞章家所推崇。台大中文系教授葉慶炳先生，在民國五十五年出了一部中國文學史。葉氏對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論著，向極重視；所以在這本書裏，特把文心雕龍設立專章，詳加說明。他說：「在唯美主義的洪流中，文體日益完備，作品日益豐富，寫作的技巧日益講究，文學的地位日益提高；於是文學批評的專家與著作應運而生。自魏晉以來，曹丕典論論文，應場文質論，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李充翰林論等，已開文學批評之先聲，及南北朝，論者益衆，如沈約、蕭統、顏之推、輩，對文學固曾發表意見；然能專力於批評事業，成一家之言者，當推文心雕龍之作者劉勰，與詩品之作者鍾嶸。此二人在我們文學批評史上之地位，不但空前，亦且絕後，在西洋文學史上，文學批評常與文學作品齊頭並進，相剋相生，我國僅在南北朝有此現象。劉勰鍾嶸以後，文學批評復趨消沈。宋以後雖多詩話、詩說之作，然罕有符合文學批評之條件者……劉勰為齊梁間人，其時聲律說興起，唯美文學之發展，已如火如茶，作家皆力求形式與聲律之美，無視於內容意境……而劉勰既無儒家固執之載道觀念，亦無唯美主義者藝術至上之偏激，於唯美文學之狂流中能持不偏不倚之見解，豈不可貴！」葉氏從中國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與南北朝時代文學思潮上着眼，其客觀而持平的分析，正可以見劉勰文心雕龍的崇高價值。

至於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 民國二十三年由世界書局初版，盛讚劉勰發揮文德之卓越貢獻，他說「文心雕龍是文學批評界唯一的大法典，此乃人人公認之事實，無論那一派文家，都不能否認。不但上括經史諸子的文心，中包魏晉六朝的辭理，即便後來唐、宋、元、明、一直到現在，一切單詞片義，隻證孤標，無不一網兼收，洪爐并鑄，他的規模，真是大不可言」。評價之高有如此者。

文心雕龍的價值，從中國文學史的材料上去諦視，是上承中國學術的統緒，下開後世文學批評之先河；不僅正末歸本之說，切中六朝唯美主義之流弊；而矯訛翻淺，更為當今民族文學的建立預留根據，所以類似這樣一部陶冶萬彙的文論鉅著，我們自然有積極研究的必要了。

十、結論

我在本文開始的時候就說，限於搜集資料的不易，而所得資料能實際可用的，又不過十之六、七。近年在台灣出版的如易君左、蘇雪林、楊宗珍、諸前輩的文學史，一時之間又尚未包括在內，這是最可遺憾的事，好則本文祇是一個初稿，窒漏的地方，容後續加補充，期使文心雕龍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更臻明確；更能提供研讀文心雕龍與治文學史的同好作十分完備的參考。

回顧各文學史上的資料，他們對文心雕龍在學術上的價值與地位推崇備至的原因，實由於它不僅盡到了矯正六朝文弊的責任

，同時也給文學進步的方向，預立了一條寬廣而有系統的指標。所以吾人欲知中國文學發展的承傳統緒，或欲建立以中國歷史文化為背景的文藝政策，文心雕龍是本必讀的要籍。

文史家對文心雕龍內容的分類，或二分，或三分，或五分，或如日人青木正兒，於文學論、文體論、修辭論、總論、以外，又加文礎論，但如依彥和序志篇上的說法，書可總分上篇下篇，前五篇為文之樞紐，明詩以下至書記，是論文敘筆，神思至總術，為剖情析采，至於時序、才略、知音、程器、四篇，乃文學批評。序志是統馭群篇的敘言。如果將此易為時下文學上的術語，則文心雕龍可分為(一)敘言：序志一篇。(二)文原論：由原道至辨騷五篇。(三)文體論：由明詩至書記二十篇前十篇是論文，後十篇是敘筆。(四)文術論：由神思至總術二十篇。(五)文評論：由時序至程器四篇。這樣既合彥和造作的原意，又酌取了各家分類之長，比較上更容易了解文心雕龍內容蘊涵的真象。

談到研讀「文心雕龍」的門徑，先由「序志篇」入手是對的，而「序志」以後，竊以為當接讀原道、宗經、辨騷，以透視其文學基本原理，其次再讀明詩、詮賦、史傳、諸子，以觀其論文敘筆之大要。神思以下，有言文筆之辨者，靈感之培養者，文章之傳統與維新者，內容與形式配合者，文學與環境關係者，文法與修辭技巧者，皆屬創作的重要環節，一定要精讀，時序以下四篇，以知音篇為尤要，其他三篇也不可忽視。文心雕龍是一部批評文學，有破有立，牽一髮動全身，過去有人嘗說讀經是「不通全經，不通一經」的話，那麼我們對文心雕龍也應該去求全面之知，如果僅讀三數篇後，便以為會心有得，驟下斷語，這雖非存心厚誣古人，但也有欺世盜名之嫌。

關於文心雕龍持論要旨，各家所說皆能得其環中，談到它的缺點，總是褒多於貶，所以文心雕龍免不了因為時代的局限，其中若干理論值得重新檢討，可是如果我們能夠棄其糟粕，揚其精醇，服膺彥和力矯文弊的苦心，則此書勢將歷萬古而不朽。

文心雕龍與佛典的關係，自來是學界爭論的焦點。不過個人以為要想揭開這個謎底，必須先確定文心雕龍成書與彥和篤信佛教的時間先後，劉大杰以為文心雕龍是彥和早期的作品，尚未信仰佛教，或正在研究內典時候的著述見本文第五節文心雕龍成書與佛教引劉大杰之說，此言容或可採，但憑空立說難以取信。恐怕我們在這方面，還需要進一步的去尋求證據。最後，我想引劉麟生先生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段話，作本文的結束。他說：「劉勰文心雕龍體大思精，是中國空前絕後的文學批評。他一方面對於時代潮流加以針砭，一方面又不違背文學發展中之正當趨勢，他的態度，是很可注意的」。